

關於宋代史料中的兩種週期

蔡涵墨*

本文探討傳世宋代史料中的兩種週期樣態的形成。本文論證，此類樣態的形成除緣自宋代政治文化之爭，也導因於其後記載與詮釋這些爭鬥的史家強加了道德價值。本文首先回顧見於《易經》之中國特有的週期概念，繼而分析強加道德性週期於歷史事件的三個例子，分別來自類書學家林駟，道學倡導者黃震，最後是編纂《宋史》的元代史臣。本文的第二部分，析論見於《宋會要輯稿》的逐年資料量及其週期波動模式。本文揭示，這些波動模式是《會要》的生產過程受政治衝突影響的結果。本文最後指出，道德週期與逐年資料量之波動週期兩者相互關聯，這兩種週期的相互關係深刻影響傳世宋代史料的總體輪廓——資料數量與內容皆然。將這些史料運用到現代史學研究以前，理解這些影響是至關緊要的一步。

關鍵詞：宋代、一手資料、週期、《宋會要輯稿》、黃震

*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東亞學系教授

身為史家，我們既受困於史料也受困於史料流傳至今的過程。在宋史研究領域有個習見的看法：由於關於北宋的研究多於南宋，這個失衡的狀態扭曲了我們對於整個王朝的理解。我將換個方式來說這個問題：我們掌握的北宋史料實際上都是通過南宋流傳至今，是因為對此一史學史的基本事實欠缺考慮，才使我們對北宋的理解發生扭曲。舉例而言，就我所知只有一位北宋作家的文集之北宋刻本傳世——其身分完全不令人意外，正是范仲淹(989-1052)。¹這意味著我們閱讀的所有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司馬光(1019-1086)、蘇軾(1036-1101)之作品，都經由南宋的版本來到我們眼前；而且，如同最近「新」發現的近一百封歐陽修書信所表明的，閱讀那些版本時必須對南宋當時的關切有一定的認知，也須對編輯者、注釋者、刊印者以及這些版本終極上預設的讀者視角有相當的認識。²

我試圖理解形塑現存宋代史料(官方與非官方皆然)的力量，並將提出我所注意到的兩種規律週期性：第一種是歷史的與道德的，第二種是政治的，儘管如同我希望揭示的，兩者最終緊密交織。如理論家所云，所有的歷史著作都在原本不過是隨機零散的事件之上強加一個故事，終極上說，也是為之下了判斷。我特別青睞研究西方中世紀的史家南希·帕特納(Nancy Partner)的表述：「歷史是以語言為方法，強加於時間之上的意義：歷史強加語法於時間之上」(History is meaning imposed on time by means of language: history imposes syntax on time)。³就像語法在隨機的聲響與

¹ 這是檢閱《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之中的北宋作者所做出的結論。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 1-134。

² 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脩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2012：1(上海，2012.3)，頁 1-28；東英壽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修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³ Nancy Partner, "Making Up Lost Time: Writing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文字上強加了意義，歷史著作同樣是在彼此不相關的事件上強加了意涵。這雖然毋庸再議，但是，一如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也使用不同的語法結構來強加歷史意義。我認為將中國——尤其是宋代——的歷史想像視為週期的，是很合適的。縱然在前現代中國，確實存在對於個別歷史發展更為線性的構想。不過，正如這篇文章嘗試證明的，儒家道德範疇於宋代思想中的復興，重新強調了這一套廣為流傳而且傳統的週期性。

在前現代的中國，時間、語法與歷史的概念源於周而復始的農業週期，如同《易經》在中國思想的核心位置所示。事實上，《易經》是宋代政治論述的主要參考與主要修辭，⁴晚宋作家更運用《易經》的語言來分析宋代歷史。十三世紀早期類書學家林駟(活躍於 1220-1237)的著作在晚宋被用於準備科舉考試，以下使用摘自其中的兩個段落為例：

慶曆君子道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深矣哉；仁宗善養之仁也。
蓋自五閭彫陋，人物翫靡，草茅岩穴，韜光晦迹，此正六陰之極。
我宋龍興，士類奮起，科目網羅，縉紳推輓，此正一陽之萌。三
聖相承。日加培植，至於仁廟，項背相望，乃六陽之盛也。⁵

第一個段落描述慶曆年間(1041-1048)「君子」之盛，並視之為宋初以來擴張科舉制度的歷史發展結果。不論在古代或今天的宋史著述，這個想法都相當常見，有如老生常談。不過，必須注意林駟的修辭，他使用《易經》的語法來表達這個轉變。五代的衰敗產生萎靡而無風骨的

Speculum 61:1 (January 1986): 97.

⁴ 參見 Tze-ki Hon, *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⁵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前集，卷 3，頁 13a。

人物，志節之士則退居山林。據林駟的概括，這正符六陰爻組成的「坤」卦。但是，沒有任何卦象是靜止不變的。變化始於太祖時期(960-976在位)的科舉，林駟以五陰爻在上、一陽爻在下的「復」卦來表示，而所謂「復」在《易經》的含意是冬天的黑暗將盡而回歸春日的明亮。這樣的變化過程貫穿宋初三帝，直到意味頂峰全盛卦象的六陽乾卦，在此代表的是宋仁宗慶曆年間。

來自林駟著作的第二個例子如下：

愚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本朝增慨焉。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於慶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不多見也。自熙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荊棘多矣。⁶

這個例子顯示，林駟將整個北宋歷史進程構思為一個完整的《易經》週期，從五代的谷底，經歷宋太祖時代的初期「復」象，進展到慶曆之全盛。自然而然，衰落總是繼踵全盛之後。據其所述，衰落始於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原來乾卦底部的陽爻轉為陰爻，而成《易經》的第四十四卦「姤」，即「遇也」。姤卦所表明的情況是，先前已被消滅殆盡的邪佞之道悄然而出乎意料地從其內部與低處再度萌現，而這正是晚宋道學對於王安石的描述。在林駟看來，確實如此：新法開啟了衰落，在徽宗(1101-1125在位)末期跌盪至谷底，返歸六陰坤卦。事實上，我們也許可藉一連串《易經》的卦象描述林駟對於北宋歷史的分析：



⁶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4，頁25a-25b。

另有數個要點必須指出。首先，注意上引第一個段落以直接引述農業週期發端，而將田園的多產與慶曆年間湧現君子等而視之。其次，這兩個段落也以君子的出現與否為主題。君子小人的對立之為宋代政治論述的基本要素，無論如何強調皆不為過，不能視之為空洞的儒家修辭而不屑一顧。這是宋代政治家所用的語言，用來鼓勵同志、界定敵人，乃至形構他們的世界。忽略這套語言對我們來說相當危險。必須注意，上引第二個段落將整個北宋歷史表述為《易經》式的君子與小人之消長。⁷

元代史臣的4卷《宋史·姦臣傳》之序言也採取這樣的取徑。這篇很容易被當成空洞的儒家訓誡而忽略的簡短序言，其實將這種本質上是道德週期的修辭概念，展演為《宋史》的一項基本結構性原理。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抹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⁸

⁷ 誠然，我們很難說林駟使用《易經》週期是獨特創舉，但林駟的用法甚為周詳，相較於其前的宋代政治修辭中的類似用法，林駟的用法可說是達至完備的頂峰。例如，范仲淹天聖五年(1027)的〈上執政書〉，開篇便申明歷史的週期性，根基於《易經》「泰」卦與「否」卦的對反：「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則，非知變者其能及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第1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上執政書〉，頁211。

⁸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71，〈姦臣一〉，頁13697。

此段落開頭的《易經》引語，必須由其原文脈絡與傳統注解來解釋：雖然每種陽卦只有一陽爻而有二陰爻，但正所謂「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僅具一陽爻之卦因此為陽。由於陽爻代表君王與君子，陽卦因此「象」一君王 / 君子以統二臣 / 小人；反之則為陰卦，二陽爻競相支配一陰爻。⁹

由於陽與陰象徵兩個關聯詞組(君與臣，君子與小人)，上述《易經》引語因此可以用兩個方式來解讀。第一，如這段序言的作者歐陽玄所解釋的，陽卦代表宋代歷史上君子——雖然人數不多(在三爻之中僅占其一)——制約小人(在三爻之中占有其二)的時期，而陰卦則代表君子數量雖然多於小人(二比一)，小人卻占主導地位的時期。但是，發生變化勢屬必然，這個情況無從避免，而且源自君王失諸「正邪之辨」。立〈姦臣傳〉的目的因此在於協助身為「有國家者」的君王辨明小人，扭轉情勢朝向陽卦的格局，造就王朝盛世。

第二，開頭《易經》引語的潛在解釋，是〈姦臣傳〉接下來所述的無德官員無意維持如同臣(陰)之於君(陽)那樣恰如其分的從屬位階，反而篡奪君王的權威，以至於國家容納著二主，他們競相爭取一臣的擁護。儘管包覆著《易經》的數術符碼，此一政治指控幾乎就是〈姦臣傳〉主要人物蔡京(1047-1162)、秦檜(1090-1155)、韓侂胄(1152-1207)、賈似道(1213-1275)的傳記之精確撮要。這四人形構了篡奪君王合法權威的邪惡權相之系譜。

這種道德週期概念也以不直接引據《易經》的形式，形構對於宋代歷史的概念。例如，我們考慮下面這一段落，其摘自晚宋朱子學者黃震(1213-1280)的《黃氏日抄》。在《黃氏日抄》中，黃震閱讀朱熹(1130-

⁹ 王弼，《周易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2，頁12b-13a。

1200)《名臣言行錄》而作的讀書筆記，是接續在他閱讀司馬遷(約 145-86 B.C.E.)以來至五代的正史筆記之後的。在黃震看來，此一安排賦予朱熹《名臣言行錄》等同正史的地位。黃震在《名臣言行錄》的個別人物評論之後，附上一段北宋歷史的宏大概述，這是他體察朱熹「陰寓」於諸臣傳記的教訓，從而凝鍊出來的精華。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矣。(1)如釋藩鎮兵權而天下定，(2)取幽燕、納李繼捧而狄患啓，(3)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4)寇萊公決策親往而邊好久，(5)王文正苟且順從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6)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韓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7)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幾危。(8)宣仁聖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9)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愚嘗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為篇，春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之史。¹⁰

這段大略中，黃震將北宋歷史分成九個事件或時期，他認為每一個都標誌著重大的政治轉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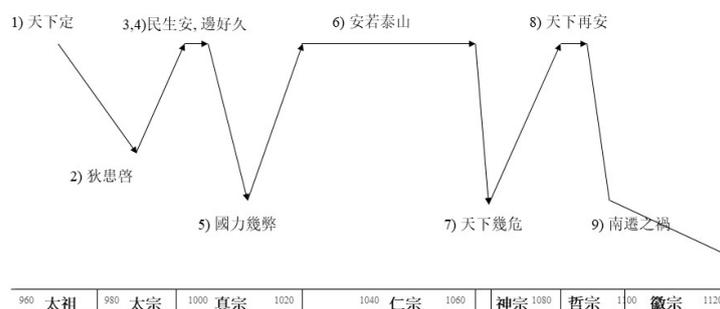
1. 宋太祖收回藩鎮的權力，奠定宋朝和平昌盛的基礎。
2. 然而，宋太宗企圖征服燕雲十六州與党項，致使北疆不寧。
3. 宰相李沆(947-1004)秉持「鎮以清靜」的原則，為人們帶來和平。
4. 宰相寇準(961-1023)說服真宗(997-1022 在位)親自前往澶淵統帥宋朝軍隊，帶來長期的邊境安寧。

¹⁰ 黃震，《黃氏日抄》(收入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第5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卷50，頁1664。

5. 宰相王旦(957-1016)同意不明智的天書祭祀，而國勢走衰。
 6. 宰相王曾(978-1038)輔佐仁宗(1022-1063 在位)，韓琦(1008-1075)「保佑」英宗(1063-1067 在位)、神宗(1068-1085 在位)，而度過騷亂時局，國家「安若泰山」。
 7. 宰相王安石頒行新法，推動邊疆擴張，國家再度陷入動盪。
 8. 高太后(1032-1093)與司馬光重建秩序。
 9. 范純仁(1027-1101)並用君子、小人，因此開啟章惇(1035-1105)、蔡京重行新法之門，國家不可挽回地走向 1127 年的災難之路。
- 必須注意，這段北宋歷史的概要聚焦於個別人物(歷史即是取決於行為正確與否的人們)，並且經常述及戰爭與和平。這段黃震察覺到朱熹曾嵌入諸臣傳記的歷史，其脈動起伏實則與林駟所述相似。而且，兩位史家運用此一週期的更替，強加相似的價值到北宋歷史之上。黃震的修辭語言清楚標誌這些價值：1「天下定」、3「民生安」、4「邊好久」、6「安若泰山」、8「天下再安」的時期是正面的，而 2「狄患啟」、5「國力幾弊」、7「天下幾危」、9「南遷之禍」則是負面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將上述歷史盛衰製為圖 1：

圖 1 黃震構想之朱熹《名臣言行錄》內含的北宋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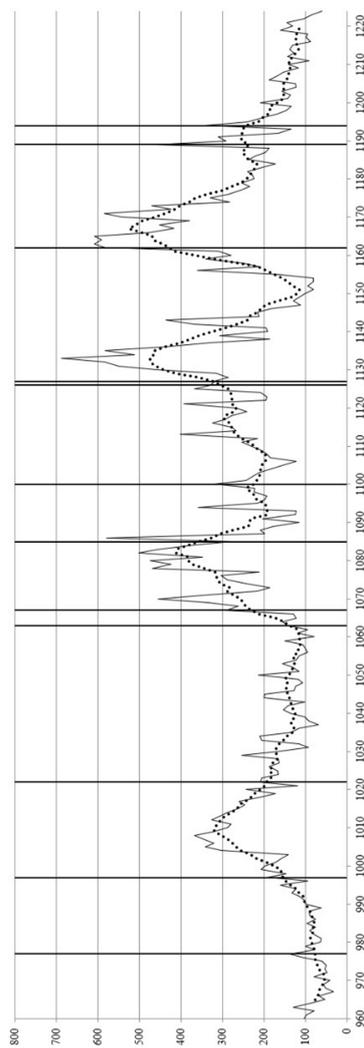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時間順序依循底部軸線。另外必須注意，引自林駟與黃震著作的這三個道德週期的例子，都強加兩條政治價值軸線：一為正，一為邪。在表述得最為完備的黃震說法中，正面的軸線行於太祖(1)、慶曆乃至於整個仁宗時期(6)與元祐(1086-1093)(8)；負面的軸線行於真宗(5)、熙寧(7)、徽宗(9)。第二、三、四時期並未參與這個模式，反映黃震對這個時期的獨特看法。身為現代學者，我們不見得贊同這些價值。不過，此一正面政治價值的「太祖—仁宗—元祐」軸線概念，出現在建炎後期至紹興初期(1120年代後期至1130年代前期)。當時，宋高宗(1127-1162在位)與他的宰輔們創造一種北宋歷史，試圖邊緣化新法，並為「中興」策畫一個異於新法的政治正當性。¹¹

現在，我將論證宋代歷史中另一種有節律的週期。此回論證關乎橫跨整個宋朝的原始材料之數量。繼而，我將提出結論，指出兩種週期之間可能存在何種相互關係：第一種是評估性的、歷史性的；第二種是定量性的；但終極來說，我希望展示其政治性的關係。

¹¹ 細節請參見 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255-273.

圖2 《宋會要輯稿》所收獨一而可繫年條目的逐年數量



資料來源：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43, Figure 1.2.

圖 2 按年展示《宋會要輯稿》的「獨一而可繫年之條目」的數量。底部的水平刻度代表的是宋朝統治年分，我以垂直細線區隔個別皇帝在位時期，而左側的刻度則是每一年的條目數量，表格中的虛線標誌每 10 年的變化均數。這個表格提取自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的《宋會要輯稿》資料庫。最初面臨一個問題：所有運用《宋會要》的學者皆知，由於《宋會要》的文本散亂流傳，因此其中包括許多重複條目。我非常感激中心的學者杜協昌編寫了一個程式，讓我能夠刪汰重複條目，從而依據數據化的《宋會要》製作一個更為精確的「獨一而可繫年之條目」表格。其中共約有 57,000 筆條目。這意味著有 57,000 個獨立事件被記錄在今天的《宋會要》。

那麼，我們從這裡看到了什麼？每年的條目數量，從最低的乾德五年(967)33 條，到最高的紹興三年(1133)年 688 條，而平均為 218 條。藉著每十年的變化均數，可以較為容易地辨識出四個高峰時期與四個低谷。四個高點分別是：1. 最初的尖峰點在真宗年間中葉，大約大中祥符元年(1008)；2. 幾乎整個神宗時期，而元豐五年(1082)為最高點，隨後於神宗逝世一年後的元祐元年(1086)猛增；3. 高宗時代早期，其中紹興三年(1133)年為最高點，也是整個資料集的最大值；4. 孝宗時代(1162-1189 在位)早期，隆興元年(1163)與乾道元年(1165)形成雙重高峰，而乾道七年(1171)亦為高點。另外有四個顯著的低點。首先，宋初的太祖與太宗(937-997, 976-997 在位)兩朝遠遠低於平均值。幾乎整個仁宗時期也低於平均值。值得注意的是秦檜執政之下特有的大幅降低，該段時期從紹興十四年(1144)開始，至其紹興二十五年(1155)逝世。最後，不計淳熙十六年(1189)與紹熙五年(1194)的猛增(各與光宗[1194-1200 在位]即位、孝宗[1162-1189 在位]逝世相關的熱切禮儀活動有關)，乾道九年(1173)以後每年的條目數量平緩卻又顯著減少。顯而易見地，將《宋會要輯稿》視為穩定、整

齊的宋朝政府記錄的印象是錯誤的。¹²

例如，乾德、開寶年間(960年代晚期)是這個數據集的低點，實際上卻是太祖掀起多方行動以鞏固宋朝統治的時期。同樣的，在建炎晚期至紹興初期(1130年代)，高宗對抗女真與偽齊以鞏固「中興」。這兩個時期都歷經大規模軍事行動，即使我們因應南宋之國家體制較北宋龐大繁複(就其官僚數量、軍隊規模、行政程序繁雜度而言均然)而有所調整，《宋會要輯稿》記錄的高宗時代訊息仍是太祖時代的20倍。

無法以單一的解釋來說明這些循年記錄量的變化。事實上，至少有三種相互關聯的動力產生影響。關於第一種動力：兩個最早的高峰期可能反映了政府的活動確切增加。第一個高峰對應景德二年(1005)澶淵之盟以後國家建設的熱烈年代，而第二個則高峰無疑與新法有關。

關於第二種動力：至少有兩個下滑趨勢反映了作為基本資料的宋朝檔案記錄之闕如。宋朝的官方歷史編纂直到淳化年間(990年代初)，也就是太宗時代末葉才嚴整開展。後來的史官曾經試圖補救初期的不足，但是沒有辦法回填本即不存在或未曾收集的記錄。¹³宋初歷史編纂的空白，讓後世得以將太祖塑造為宋朝盛德之泉源，儘管這樣的形象與其實際上的軍事背景頗不協調。之後的發展眾所周知，秦檜在紹

¹² 這些規律不太可能是《永樂大典》的編者們操弄《宋會要》文本的結果。相較於清朝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的《四庫全書》計畫，沒有證據表明大明朝對於《永樂大典》的內容進行意識形態的過濾。而且，由於《永樂大典》按聲韻組織類編全書，《宋會要》的內容因此被分割為將近四百個韻類。考慮到這個方法，很難想像如何強加審查制度於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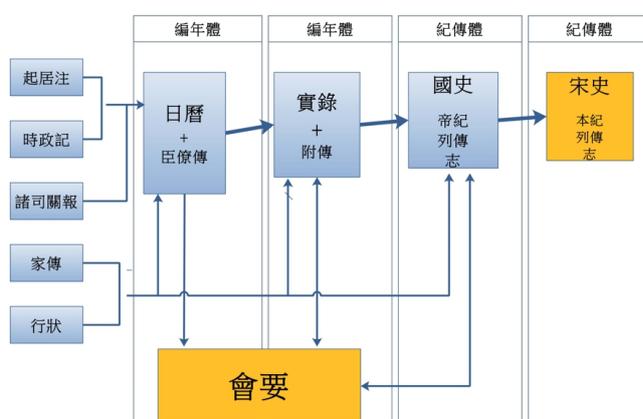
¹³ Johannes L. Kurz, "The Consolidation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6:1 (January 2012): 13-45.

興十二年(1142)中止史館的運作，直到他紹興二十五年(1155)逝世都沒有恢復。同樣的，後來的史家無從回填記錄的空白，而且，隨著秦檜的歷史形象轉向負面，他們積極刪除秦檜所維持的記錄中關於他及其政策的正面敘述。¹⁴

在此一變化背後的第三種動力最為複雜與有趣，它牽涉到彙編《會要》的歷史，以及造就今本《宋會要輯稿》的各種政治與編輯選擇。我們知道，《宋會要》的歷史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課題，而我在此所述僅是最為基本的概要。

¹⁴ 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a Villain: Ch'in Kuei and Tao-hsüe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1 (June 1998): 68-72; 蔡涵墨，〈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收入蔡涵墨，《歷史的嚴妝——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11-15。確實存在零星的證據，特別是關於秦檜的經濟政策者。案例細節可參考李椿年（卒於 1159）的「經界法」，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據民國二十年[1931]北平圖書館影印原稿本影印），〈食貨六·經界〉，頁 35a-52b。

圖 3 唐宋官方修史的過程



資料來源：平田茂樹，〈宋代の日記史料から見た政治構造〉，收入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主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 30；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5, Figure 0.1.

這張基本上改編自平田茂樹原來所繪製的圖表，呈現出《會要》與其它宋代官修史籍的關係。我們一般認為，《宋會要》是個檔案庫。但是，充分的證據顯示，宋代官員將《會要》視為先例大全，用作行政方面的決策、行動之參照。圖表中的箭頭顯示《會要》與《實錄》、《國史》的採用與被採用的方向，正凸顯了這一點。《會要》是實用的施政手冊，因此需要持續的改編，也因而一直遭受政治操控。

以表 1 列最重要的《會要》，逐項開列編纂時期(較後的數字是進呈的年代)、卷數、資料的涵蓋年分與主要編纂者。

表 1 宋朝《會要》編纂的基本資訊

題名	編纂時期	卷數	涵蓋年分	主要編纂者
國朝會要	1030-1044	150	960-1043	王洙
增修國朝會要	1070-1081	300	960-1077	王珪
重修國朝會要	1100-1118	110 [+400]	1067-1106 (?)	蔡攸
續四朝會要	1168-1170	300	1067-1127	李燾
中興會要	1170-1173	200	1127-1162	陳騏
淳熙會要	1173-1179	158	1162-1173	陳騏 王淮
	1179-1186	130	1174-1183	
	1186-1192	80 [=368]	1183-1189	
嘉泰孝宗會要	1200 (?)	200	1162-1189	
慶元光宗會要	1196-1200	100	1189-1194	
寧宗會要	1202-1203	150	1194-1201	1221 年重修
	1213	110	1202-1211	1194 年至 1201
	1221	110 [=360]	1212-1220	年的會要
寧宗會要	1242	150	1194-1224	史嵩之

資料來源：王雲海，〈宋代官修本朝會要〉，收入王雲海，〈王雲海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 28-31；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150-165。

表中可見兩個相當突出的趨勢。第一，在慶曆四年(1044)王洙(997-1057)纂成最早的《會要》之後，續編的《會要》常規地修訂前編的內

容。王珪進呈元豐四年(1081)《增修國朝會要》的表文時，即坦率表示他「通舊增損」，大幅修訂慶曆四年(1044)的前編。¹⁵同樣的，當李燾(1115-1184)在乾道六年(1170)完成迄於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的《會要》，他決定重作存在王珪與蔡攸編纂成果中的熙寧年間記錄。於是，他將編纂計畫的起點設於治平四年(1067)，著手修訂，而非不加改變地採用王珪所編的熙寧年間記錄。此事的重要性是甚麼？雖然《會要》中熙寧年間的文獻無疑是真確的，且源自王珪原始的編纂，然而，這些文獻的選擇與安排，以及它們的政治與歷史評價都是李燾的，而不屬於王珪。因此，這些文獻反映出的歷史觀點，不只對立於新法，且是在新法之後一百年編寫的。

第二，涵蓋整個治平四年至紹興三十二年(1067-1162)期間的《會要》，是李燾與陳騏(1128-1203)在熙寧元年至熙寧六年(1168-1173)的五年之間敲定完成的。我想指出，《會要》為宋代歷史關鍵一百年(牽涉了熙豐新法、靖康之難與南宋中興)所保留的記錄，一律出自參與孝宗朝政治的這兩人之手。乾道九年(1173)以後的情況則幡然改觀，朝廷開啟即時編纂《會要》的進程，基本上十年一修，而各次的編修內容，在每位皇帝死後會被濃縮與整併。

然而，最為關鍵的要點是，現在我們所見的《宋會要》並不是這些原始彙編的客觀中立之縮編本，而是 1180 年出自趙汝愚(1140-1196)所請而纂成的一部特殊節編。下面是王應麟(1223-1296)《玉海》關於這項計畫的編年記事，讓我們窺知趙汝愚的動機與該部《會要》的纂輯歷程：

¹⁵ 王珪，《華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44，〈進國朝會要表〉，頁 17b。

1180年—淳熙七年十月九日，祕書少監[趙]汝愚言：「《國朝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今上會要》，分為四書，去取不同，詳略各異，請合而為一，俾辭簡事備，勢順文貫。」從之。

將作少監張從祖類輯會要，自國初至孝廟為一書，凡二百二十三冊，五百八十八卷。

1208年—嘉定元年四月十六日，詔祕省寫進。

1210年—三年六月十六日，上之。¹⁶

趙汝愚的動機有二。第一，在李燾與陳騏之時重啟而積極進行的《會要》編纂，最終形成好幾部《會要》。這導致當時的官員為了研究一個議題，總須查閱數個修訂本，因此趙汝愚請求將數個版本整併為一，以便於查閱。然而，如趙汝愚的措辭暗示的，這其中也有政治動機。余英時已經詳細解析，趙汝愚是一個受到道學影響並支持各種政治改革的政治聯盟(朱熹是其成員)的領導者之一。¹⁷《總類國朝會要》即供作這個運動的研究手冊。當然，這個編纂計畫在韓侂胄時期進展不大，但在他於開禧三年(1207)遭暗殺之後迅速完成。必須注意到，在趙汝愚請求作為《總類國朝會要》基礎的四部《會要》中，李燾與陳騏在孝宗時所編的《中興會要》與《今上會要》蔚為主體，而整個治平四年(1067)以降時期的所有資料便全然仰仗這兩部《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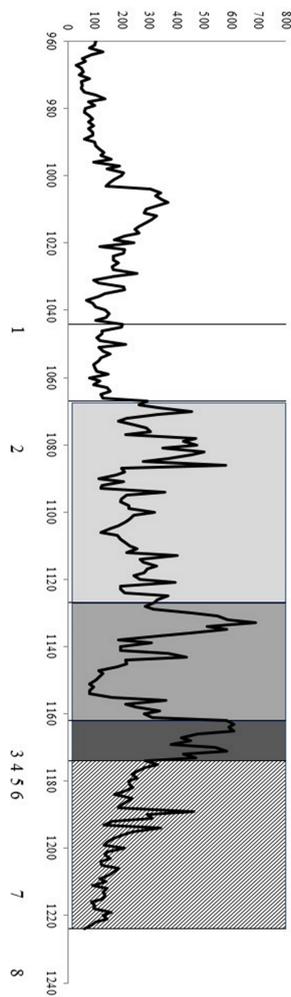
¹⁶ 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據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本影印)，卷51，頁39-40。

¹⁷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2冊(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98-216。

接下來快速述評《總類國朝會要》。這部嘉定三年(1210)的會要在史彌遠(1164-1233)執政的二十五年被塵封。端平元年(1234)的端平更化要求李心傳(1167-1244)補入新的記錄，當時《總類國朝會要》涵蓋的資料迄於乾道九年(1173)。李心傳迅速根據淳熙元年至嘉定十七年(1174-1224)之間編成的大量《會要》，為嘉定三年(1210)的《總類國朝會要》增補了乾道九年(1173)以後的條目。這個成果可能在四川與臨安付之梨棗，而其中一個本子日後被抄入《永樂大典》。

圖 4 摘錄了以上所有資訊，並疊映在臺大《宋會要》資料庫提供的逐年變化上。

圖 4 《宋會要輯稿》的演變



- (1) 1044—王洙進呈《國朝會要》(資料涵蓋960-1043年)
- (2) 1081—王珪進呈《增修國朝會要》(資料涵蓋960-1077年)
- (3) 1170—李燾進呈《續四朝會要》(資料涵蓋1067-1127年)
- (4) 1173—陳騭進呈《中興會要》(資料涵蓋1127-1162年)
- (5) 1179—陳騭進呈《淳熙會要》(資料涵蓋1162-1173年)
- (6) 1180—趙汝愚請求編纂《總類國朝會要》(資料涵蓋960-1173年)
- (7) 1210—秘書監進呈《總類國朝會要》(資料涵蓋960-1173年)
- (8) 1236—李心傳進呈《續總類國朝會要》(資料涵蓋960-1224年)

資料來源：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47, Figure 1.3.

這個圖表試著呈現兩件事：一、今本《宋會要輯稿》所據的諸種《會要》，若就涵蓋範圍來看，彼此之間是有重疊性的；二、各本《會要》涵蓋的時期與其編纂的年代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間隔。因此可以看到第2《會要》與第1《會要》重疊，第3《會要》與第2《會要》部分重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乾道六年與淳熙七年(1170-1180)之間的蓬勃編纂活動，以及第1、2、3《會要》涵蓋的年代與編纂日期之間的時間間隔很寬，而第5《會要》則相反。舉例言之，建隆元年(960)宋朝建立與慶曆四年(1044)編纂第1《會要》相距80年，而宋朝建立與元豐四年(1081)編纂第2《會要》間隔超過120年。與此相似，新法與乾道六年(1170)李燾的編纂工作之間隔了一個世紀。相對的，第5《會要》於淳熙六年(1179)告竣，僅在資料涵蓋年分的迄期之後6年。

這個圖表也有助於了解何以現存《宋會要》所涵攝的記錄，其詳略有如此劇烈的起伏。例如，資料涵蓋年分與編纂日期的時間相距甚近，可以解釋孝宗朝的最後一個高峰，前已述及陳騭能夠接觸大量當時文書。建炎晚期至紹興初期(1130年代早期)的第三個高峰則較難解釋。不過，我懷疑這與李燾和他的政治同志積極將他們青睞的政策歸諸高宗本人與高宗初年——也就是秦檜上臺以前的時期——有關。孝宗朝最初十年(1160年代)企圖重組中興的歷史基礎，在我看來，這個現象解釋了秦檜之前的建炎晚期至紹興初期(1130年代)的資料高峰。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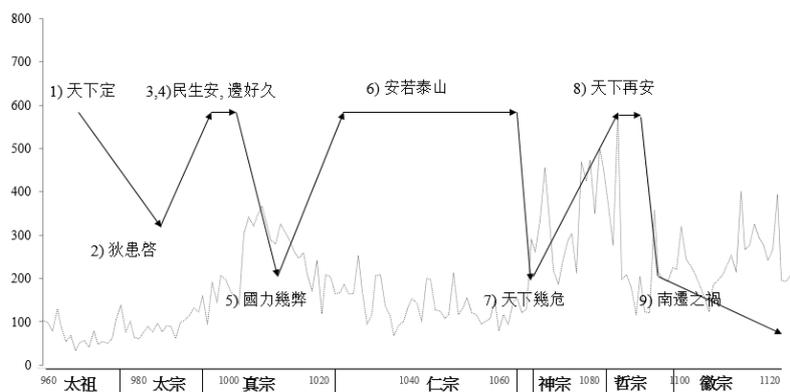
至於剩下的兩度衰退，李心傳在端平三年(1236)纂成《續總類國朝會要》之倉促，可以解釋淳熙元年(1174)年以後的最後一次縮減。他身在四川，不若乾道中後期至淳熙前期(1170年代)的陳騭所從容享有的時間與資源，無法在館閣仔細搜尋大量的相關時期的文書。仁宗朝的衰

¹⁸ 見蔡涵墨，〈陸游《中興聖政草》考〉，《歷史文獻研究》，36(上海：2016)，頁137-152。

退則與新法支持者王珪在元豐四年(1081)編纂第二《會要》時的朝政有關。眾所周知，王安石構建新法，以修正其所認定的仁宗年間(特別是晚期)之制度隳壞。王珪輕簡打發該時期，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在後來逐漸浮現出來的「太祖—仁宗—元祐」的正面價值軸線上，仁宗時期是至關緊要的，儘管如此，王珪對仁宗朝的記述，依然是南宋時關於該時期唯一可用的《會要》。即便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曾做了果敢的嘗試，然而，無論南宋史家多麼贊同慶曆的改革者，王珪元豐四年(1081)版的《會要》所造成的仁宗朝資料之稀薄狀態，仍是他們無從迴避或藉由增廣而徹底改變的困境。

目前我們檢視了現代《宋會要》資料庫的規律性週期的所有峰值與衰降。如果我們疊映兩種週期，大致上會發現：黃震賦予每個時期的道德特色，與《宋會要》記錄資料的深度，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性。換句話說，黃震所云的正向時代多是資料衰降之時。這對宋初與仁宗朝恰如其分，而元祐年間則為顯著例外，元豐八年(1085)是《宋會要》的第二個資料量高峰，正好對應黃震對元祐的褒美。

圖 5 黃震之北宋歷史構想與《宋會要》逐年條目對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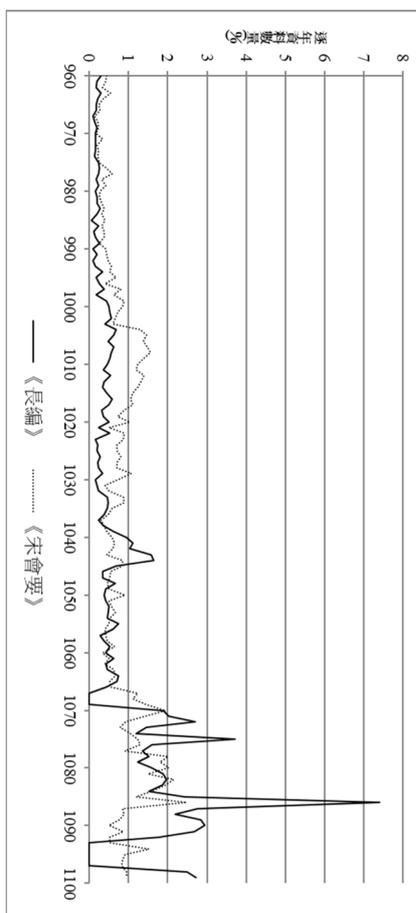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當我們比較今本《宋會要》記錄資料的深度與其它宋史著述的模式，會浮現出兩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第一，儘管《宋會要》的組成與流傳經歷各種跌宕起伏，但究竟南宋史家依傍之文獻基礎為何？若要考察其情況，《宋會要》仍是現存的最佳衡量基準。

第二，我們可以了解其他史家如何在著作中調整資料數量，以凸顯他們所偏愛的、具有道德性的「太祖—仁宗—元祐」之軌跡。

圖 6 《續資治通鑑長編》與《宋會要輯稿》逐年資料數量比較



資料來源：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87, Figure 2.1.

說明：《宋會要》的數據來自於統計每年的條目總數，以及標準化處理：將年度總數除以 960 年至 1099 年之間所有條目的總數，再乘以 100。《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數據來自於統計中華書局本的每年所占頁數，再用一樣的方法標準化處理。

圖 6 比較了《宋會要》與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歷年資料量。必須注意李燾偏離《宋會要》之處。第一，他明顯輕描淡寫真宗時期的第一個資料高峰，換言之，他使用的資料遠少於他應能取得的量。第二，他擴增慶曆年間的資料數量。第三，他大幅增加元祐年間的資料數量。請記得，李燾也是現存神宗朝的《會要》條目的編纂者，因此，他決定在《續資治通鑑長編》擴增這個《會要》已有大量資料的時期，反映出他有意強調，元祐時期的重要性在於修正新法，這當然也反映他的政治態度。《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讀者即知，元豐八年(1085)與其後的巨幅成長不僅因為記述了司馬光對於新法的修正，而且還記載了在司馬光死後，元祐執政者對於如何做才能最好地反擊新法的議題，彼此之間存在著分歧見解與政治派別。

總之，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檢視《宋會要輯稿》的訊息數量，為我們的研究課題汲取一些教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宋會要輯稿》呈現一個各種影響相互交織而成的複雜景象，那些影響的三個來源包含主要的《會要》編纂、《總類國朝會要》以及《總類國朝會要》曲折的傳世過程。然而，隨著發現與區別這些影響，資料的長處與缺陷因之顯而易見。毫無疑問，對於依據《宋會要輯稿》進行歷時性研究，亦即調查長時段現象的學者而言，其文獻基礎之深度變化是個陷阱。宋初與乾道九年(1173)以後的條目之危險性尤其嚴重。不過，各時期所潛藏的問題並不相同。宋初資料的缺乏為慶曆史家創造空間，得以將他們偏愛的前例往前追溯，而後世之人大多不假思索地接受這套國初「歷史」。因此，不加批判地使用《宋會要》的宋初資料，其風險就是接受後代史家懷有目的而創造出來的歷史。乾道九年(1173)以後條目的危險性則全然不同：這段時期曾經保有充足的原始文件，那些條目卻是經過濃縮而簡略、偏袒、具有黨派色彩的樣本。

另一方面，《宋會要輯稿》有利於針對資料數量高峰時期，開展

制度與國是的共時性研究。受到這些時期的資料量所吸引，現代宋史研究確實展現對於新法、中興初期、孝宗年間的極大興趣。由於這些時期的文件數量較為豐富，歷時性的研究也傾向於深入談論這些時期。這造成一種錯覺，即整體上來說這些時期的歷史之重要性大於其它時期；或者，換個方式說，在高峰時期發生的事情遠較低潮時期為多。不過與此同時，高峰時期的宏富資料讓我們能更精細地洞悉建炎晚期至紹興初期(1130年代)和紹興晚期、隆興與乾道年間(1160年代)歷史編纂之政治性。這並不是因為發生在高峰時期的事情為低潮時期立下基準，而是因為這些資料讓我們理解高峰時期是如何與為何被創造出來。

(本文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稿；2020 年 9 月 2 日通過刊登)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審閱與建議，也感謝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邱逸凡主譯這篇文稿，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詹前倬協助翻譯修訂稿並通篇修潤。譯稿經作者審定。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珪，《華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弼，《周易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據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本影印。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成都：巴蜀書社，1990。
-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2 版。
- 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脩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2012：1(上海，2012.3)，頁 1-28。
-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據民國二十年(1931)北平圖書館影印原稿本影印。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黃震，《黃氏日抄》，收入黃震著，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二、近人論著

- 王雲海，〈宋代官修本朝會要〉，收入王雲海，《王雲海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 24-37。
- 平田茂樹，〈宋代の日記史料から見た政治構造〉，收入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主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 29-67。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 東英壽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修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陸游《中興聖政草》考〉，《歷史文獻研究》，36(上海，2016)，頁 137-152。
- 蔡涵墨，〈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收入蔡涵墨，《歷史的嚴妝——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2-97。
- Hartman, Charles. "The Making of a Villain: Ch'in Kuei and Tao-hsüe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1 (June 1998): 59-146.
- Hartman, Charles.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Hon, Tze-ki. *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 Kurz, Johannes L. "The Consolidation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6:1 (January 2012): 13-35.
- Partner, Nancy. "Making Up Lost Time: Writing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Speculum* 61:1 (January 1986): 90-117.

三、網路資料

-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宋會要輯稿》資料庫，網址：http://thdl.ntu.edu.tw/L303_SongHuiYao/CustomizedHome.php，擷取日期：2020年1月20日。

On Two Types of Cyclicity in Sources for Song History

Charles Hartm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wo types of cyclical patterning in the surviving sources for Song dynasty history. I argue that this patterning results from struggles within So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from the imposition of moral values by the historians who later chronicled and interpreted those struggles. After a review of the distinctively Chinese concept of cyclicity as contained in the *Yijing*, I analyze three examples of moral cyclicity impo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by the encyclopedist Lin Jiong, by the *daoxue* advocate Huang Zhen, and, lastly, by the Yuan historians of the *Song History*.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urviving patterns of cyclical fluctuation in the depth of chronological coverage in the *Song huiyao jigao*.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patterns resul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flict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ong genre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known as the *huiyao*.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these two types of cyclicity are interrelated, and that this interrelationship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ontour (both in coverage and content) of the surviving corpus of sources for Song history. Understanding these influences is a vital prelude to utilizing those sources for modern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Song dynasty, primary sources, cyclicity, Song *huiyao jigao*, Huang Zhen